

六十年

LIU SHI NIAN
GUO SHI JI YAO

国事纪要

贺耀敏 武力◎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

郑惠

林蕴晖

经

济

卷

六十年

LIU SHI NIAN
GUO SHI JI YAO

国事纪要

经

济

卷

贺耀敏武

力◎主编



丛书主编

郑惠

林蕴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十年国事纪要. 经济卷 / 郑惠, 林蕴晖主编; 贺耀敏, 武力分册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438 - 6026 - 1

I. 六… II. ①郑…②林…③贺…④武… III. ①中国 - 现代史 - 大事记 - 1949 ~ 2009②经济史 - 大事记 - 中国 - 1949 ~ 2009 IV. K270.5 F1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050 号

六十年国事纪要 (经济卷)

主 编: 贺耀敏 武 力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雄伟 章红立 黎晓慧 洪江水 杨 纯 吴向红

装 帧 设 计: 谌 茜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25.5

字 数: 557000

印 数: 1 - 4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026 - 1

定 价: 46.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一段话。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走向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理论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中国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这个伟业，不是轻而易举的。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到1956年，在整个社会没有受到严重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国际上，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承认。毋庸讳言，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出现过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奔跑的现象；幻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在经济建设上创造“大跃进”的奇迹，以在超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还试图通过阶级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来实现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结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

历经 30 年的艰难曲折，以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逐步找到了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个崇高目标的具体途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把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自由繁荣、文明先进的中国的目标具体化、规范化了。实践表明，从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30 余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一目标迈出了扎实的步伐。依法治国初见成效，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准也有了明显提高，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然，整个来说，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既定目标，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全国人民正在为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时刻，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全方位回顾和总结共和国所经历的一些大事要事，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先进中国的规律，是十分必要和极为有益的。为此，我们约集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研究的学者，编写了这部五卷本达 200 余万字的《六十年国事纪要》奉献给社会，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周年大庆的献礼。

林蕴晖

2009 年 5 月 1 日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述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却不能扫除掉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的结果。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四代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经过 60 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温故知新，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展望明天，这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本书欲达到的目的。

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历程的简单回顾>>>>>

新中国 60 年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历程，大致可以 1978 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 1956 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

60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 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7年间,一方面我国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3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这7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7年。1949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我国全面贯彻实施的3年,党和政府仅用了3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3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中国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落后,人均GDP仅为119元,城乡人均银行储蓄仅为1.5元,工业化的资金极为匮乏,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国进行了经济封锁,而且还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即使从国家安全和建立独立国防工业的角度,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也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当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为加快工业发展,就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才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鉴于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总的来说,这7年既是新中国凯歌行进、意气风发、成就巨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因缺乏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民主革命时期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到更多地信从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标志就是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而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辉煌与误区同在,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历史的突出特点。

(二) 1958—1978 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我国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发展道路的开始。这场探索可以说是历尽曲折艰辛。到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这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①从1958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4339.39亿元,是“一五”计划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8.82倍。从1958年到1978年,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为:炼钢2911.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新增炼钢能力的10.34倍;煤炭开采36510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5.73倍;发电机组容量4859.5万千瓦,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9.68倍;石油开采1097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83.64倍;化肥1132.5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22.57倍;水泥4614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7.66倍;棉纺锭830万锭,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13倍;机制糖234.8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3.79倍;自行车318.6万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6.37倍;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18458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43倍;新建公路153316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84倍。^②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除公路增长较慢外,其他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靠增加投入和牺牲消费来维持的。

从就业结构来看: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再从就业结构来看,

① 1958年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1978年则按1970年不变价格。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351页。

1957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共有19310万人，到1978年，农业劳动者增加到29426万人，而同期农业总产值仅增长84%，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少。如果考虑到197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7年下降4.55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95.8倍，则农业剩余人口问题更为严重了。

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①人均食品消费情况：1957年人均粮食612斤，棉花5.2斤，油料13.2斤，肥猪0.11头，猪牛羊肉12.5斤，水产品9.8斤，到1978年，上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仅为粮食637斤，棉花4.5斤，油料10.9斤，肥猪0.17头，猪牛羊肉17.9斤，水产品9.7斤，多数增长不大，少数还有所下降。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4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②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鉴于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当时称“生产关系”）到底是解决了，还是加剧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异议和不同声音压了下去。单一公有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以集权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为后来20年的“左”的错误种下了根源。

人口增长过快，是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使人口在1960和196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960年底比1959年底减少人口1000万，1961年底又比1960年底减少348万。从1957年底到1961年底，4年内全国总人口仅增加1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63‰，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阶段。1962年以后，全国出现了一次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顶峰，全国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当年人口比上年增加1877万。其后又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直到1973年党和政府将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切实抓紧计划生育工作，才使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到1978年的13.53‰。到1978年底，全国总人口以由1957年底的64653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20年里人口增加了近50%。^③

（三）1979—199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9年至1997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此

① 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② 以上数字除特别注明出处外，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从前 28 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继续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首先,我国经济以 1978 年的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纠正和清算了前 20 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再者,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984 年“六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五年计划。受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鼓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追求提前翻番的传统思想和实际存在的新旧体制摩擦,使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处于躁动和不安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是稳定经济为主还是继续加快改革,意见不一,对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分歧也很大,于是,国民经济经历了 1986—1987 年的“软着陆”,1988 年价格“闯关”和 1989—1991 年治理整顿的曲折。但是,这种曲折,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只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作用。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迅速发展,到 90 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比较平衡,客观上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正确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 1992 年到 1997 年的 6 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 1997 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定 2000 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状态。

(四) 1998—2009 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97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年代。这一年,最重大的变化是我国经过近 20 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终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买方市场,从 1998 年开始,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也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转向了需求约束型。同时,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敲响了警钟,国有企业改革从 1998 年起进入了攻坚阶段,金融改革加大了力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加快了步伐。从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从 1998 年也开始转向扩大内需。

1997 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党和政府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十六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如下一些新问题：一是能源不足问题；二是人口就业和粮食安全问题；三是环境保护问题；四是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问题；五是深层次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六大。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五个统筹”全面协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这些都是促进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思想。

在这个阶段，在“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出台了以下几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一是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基础上的回归和保持了这两个地区经济的繁荣稳定，并且加大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流，实现了“三通”。二是着手调节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三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是推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统筹城乡发展政策，不仅取消了长达2600多年的农业税，而且加大了国家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力度。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5955亿元，2009年计划投入7161亿元。五是政府财政基本实现了由过去长期的建设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变。六是大力推行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中央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并将其作为指令性指标列入了第十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规划。七是在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推进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医疗卫生改革，并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的需要。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提出：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节能环保水平，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可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不仅获得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

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三，而且党和政府管理经济和应付风险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并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理念。因此，目前的中国经济，虽然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未来的预期是光明的，那就是：我们不仅在经济体制方面正在不断完善，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也逐步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回顾新中国 6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里仅列举一些我们的肤浅总结。

（一）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必须与时俱进

由于我国走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与苏联不同，苏联是由无产阶级革命退到新经济政策，然后再进到社会主义的；我国则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进到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这个理论比较成熟、实践也比较成功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国情并卓有成效的社会制度。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就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就多多少少存在一个所谓的“历史情结”。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放弃了七大上提出的必须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受到党内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的影响，由此发生的急于消灭私营经济和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脱离了中国国情。^①

从历史来看，这是我国 60 年来所经历的三个前后相联系的历史阶段，从理论是来看，三者之间又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扬弃与发展关系。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只能站在今天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观念来看待三者的关系，既不能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角度，更不能站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角度。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52 年底的这段时间，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这个判断，史学界几乎没有疑义。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进一步说，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个问题的引申，即产生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探讨，因为除了不可变更的历史发展顺序（包括不同的历史时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以及中间经过了一个 20 余年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外，二者在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以及发展方向方面都非常接近，以致不少人往往忽略了其差异而认为是体制的复归。

^① 参见胡绳：《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瞭望·新闻周刊》1998 年 8 月 17 日第 33 期。

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准确恰当地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以及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笔者认为，对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评价，应从理论和历史两个角度结合去研究。

一个角度是从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角度，亦即中国共产党探索和解决中国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21—1949年，经过28年的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即形成于这个时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革命，即推翻三座大山，扫除中国发展的障碍，因此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即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和政策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恢复经济、巩固政权，顺理成章地贯彻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既是惯性使然，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1949年至今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探索主线始终是寻找一条加速中国建设发展和人民共同受益的道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社会发展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像建党初期怎样搞民主革命一样，是个陌生的问题，因为1949年以前的根据地经济毕竟只是一种战时的、农村的、区域的经济，并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战争，而不是发展问题。1949—1952年，如前所述，当时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恢复问题，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操作性探索才刚开始。而50年代前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化的迫切心情，与苏联20—30年代又很相近，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令人景仰（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揭开了“盖子”，发现其工业化也有不少弊病），因此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就在所难免了。从1953年到1978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又试图改革其弊病的前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正确的改革思路和错误的改革思路并存和交织在一起，但党内“左”倾改革思路占上风，直至演变成“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共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的改革思路开始处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教训，既是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也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这个理论提供了参照。

由于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完成各自历史任务）艰辛探索的科学结晶，因此不仅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前后相承的发展关系，甚至两个理论都是在一代人身上形成的，领导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主要参与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探索的科学结晶，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党民主革命时期探索的科学结晶，其中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体现出来。是否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是20世纪40年代末党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20世纪90年代党对鸦片战争以来150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后者既包含前者，又比前者更丰富、更深刻，因为后者经过了对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扬弃并吸取了

战后 40 余年中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第二个是历史进化的角度。时间是不可停止、不可逆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目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终成果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障碍。因此它所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民主革命的产物，它之所以不同于早期独立国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既反封建又反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主革命。在当时资本主义弊病丛生而这些国家又缺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只能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共同起作用的混合经济体制。而战后经济的发展则不断证明，无论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还是贫富差别很大、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都不如这种模式好。实际上，战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改革，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都是趋于计划管理与市场调控并重、重视社会二次分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大概就是缘于此，但是在当时，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把它作为过渡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成熟的经济形态。这种历史性的失之交臂，也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只是民主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自然选择。

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已成为历史的经济形态和理论。从 1949—1952 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经过“四过”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经过缓慢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私营经济的办法，中国恐怕都要走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因为中国的国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否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正确思路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为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新中国经济 40 多年来发展选择的结果，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国际环境、党和人民的心态来说，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不一样了。

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后者与前者的相近之处尽管很多，但也不是一种体制上的“回归”，而是包含，是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即后人的体制总是要剔除前人不正确或过时的东西，包含前人正确的东西，这才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巨大作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存在和发展；抱残守缺、囿于成见，只能葬送社会主义。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曾经失去过几次历史契机，也抓住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经有过三次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

第一次是 1956 年中共八大以后。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苏联教训和自己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旨在弥补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体制变革设想，使我国再次面临历史契机。但是由于受“反右”运动和“反‘反冒进’”的影响，却走上“大跃进”歧途。

第二次是 1961 年至 1963 年。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方式，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使中国面临着一个经济改革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和批判“单干风”，直至发动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契机。

第三次是 1974 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整顿”。此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城市就业困难、民主和法制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对“文革”和极左的那套思想和体制已经失望，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和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又给了中国改革和发展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罢免邓小平领导职务导致了这次历史契机的丧失。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则及时抓住了每一次历史契机，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

第一次是 1978 年。当时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不满，对“拨乱反正”和经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满，要求改革。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抓住这次历史契机，终于将中国引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第二次是 1992 年。由于受治理整顿、国内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束缚而彷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拨开迷雾，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① 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顺势破竹般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

第三次是 2002 年。我们抓住改革开放 25 年所创造的坚实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并针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随后又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新理念，即科学发展观，使得最近 7 年来，我国不仅继续保持了非常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缓解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提高了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初步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前三次经济发展和改革历史契机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受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干扰，都是将实现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第一位，结果陷入生产关系处于第一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处于第二位的陷阱，甚至被“四人帮”所利用，歪曲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5 页。

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与此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党能够抓住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则是将“三个有利于”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判断改革和发展。如果以生产关系为第一标准,由于对于生产关系的理解总是受当时认识的局限,就很难准确评价是非。

(三)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中国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 60 年,如果以 1978 年为界,前 29 年所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的经济体制恰恰是后 31 年致力于改革的体制。因此,无论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还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无法绕开对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

对于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与当时国情的关系;第二是它的绩效如何。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种方法是从理论上分析,即以改革开放前夕的经济体制作为对象进行分析,排除了对不同历史阶段差异的考察。这种抽象的方法对于认识改革的起点、任务不失为一种简捷方法,并且为许多人采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通过系统考察原有经济体制产生演变的历史及其历史条件,寻找出这种经济体制形成演变的原因以及作用的变化。

对于第一种方法,如果以 1978 年以前“文革”十年的经济体制为对象,可以说,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可言,也无公平可言。

从宏观计划管理来看,从 1966 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 1976 年开始实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都没有正式形成计划,计划管理的水平相当低,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性质的、粗放的、随意性很大的计划经济。

从微观经济运行来看,农村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城市批判“奖金挂帅”、“利润第一”,将生产和分配中的“大锅饭”发展到顶点,再加上政治动乱的干扰破坏,效益非常低。这种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严重脱离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教育落后的国情。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文革”十年也将不公平发展到极点。一是严厉限制农民的流动和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农民不仅丧失了迁徙流动的权利,也丧失了生产自主权和收益支配权;二是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其社会地位受到空前的贬低;三是城市的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剥夺了其选择就业和居住地的权利。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由选择程度的增加,则基本没有改善,甚至有所恶化。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是 1978 年以前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压制和对人民的束缚,才使改革开放初期爆发出巨大的“纠正效应”,也使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为改革和发展提供较多的空间。

如果以第二种方法来分析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就会看到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其体制和政策有差异,而且其作用也有较大差异。

对于 50 年代前半期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以消除旧中国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

十分混乱^①”。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和威胁，在这种条件下，要迅速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经济，保证国家安全，实施赶超战略，就要集中使用有限的积累和资源，这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1956年以前的经济体制变革的积极作用还是大于消极作用的。问题是中共八大以后，不仅没有及时纠正因过快发展重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将经济体制和管理方法推向脱离实际的公有制和“外行领导内行”及“运动”群众。

1958年的经济体制变革可以说是三年“大跃进”的制度基础。同样可以说，党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我国工业化水平低，使得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低水平、低效率、随意性很大、贯彻长官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工作的过多干预及其失误，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结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即使从理论上可以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可以完善的，但是由于它脱离了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在目前的条件下是无法完善的。这不仅表现在单一公有制束缚了人民个人的自主、自由和独创性，也表现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不可能及时有效、准确地获得足够信息，制定灵活、恰当的决策。另外，从根本上来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也不能适应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然规律，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使人们获得更多、更大自由、活动空间和多样性选择的规律。

（四）“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回顾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完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目标、充分考虑改革措施的阶段性和可行性。

不少人通过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认为我国的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具有由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逐渐向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推进的特点，即通过传统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发展和增量改革创造的巨大成效支撑原有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和起到改革示范作用。

这种概括的确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是笔者认为上述概括尚不够全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空间。对于农村改革来说，一开始就是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表现出速度快、彻底的激进特点。同样，对于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中国的改革也是起步较早的，是大胆、迅速推进的。在80年代初期国内尚在探讨私营经济能否存在、怎样完善计划经济时，就建立了经济特区和鼓励“三资”企业发展。可以说，中国改革的特点，除了上述的改革起点不同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里所讲的“实事求是”，不仅是说中国的改革理论、政策和措施来源于对实际和经验的总结，还包括在制订和推行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或及时注意到其可行性。具体表现就是当改革应该激进并且可以激进时，就激进；没有弄清情况或阻力较大时，就通过试点或外围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